

民国史纪事本末

六

● 主编

魏宏运

● 辽宁人民出版社

抗日战争时期·下

民国史纪事本末

抗日战争时期·下

●主编 魏宏运 ●杨光彦 张国镛 撰 ●辽宁人民出版社

六

目 录

“孤岛”的畸形繁荣	1
第一次长沙会战	10
国统区的宪政运动	20
桂南战役	30
日蒋港澳密谈	42
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	53
成都抢米风潮	64
皖南事变	74
华北军民反“扫荡”斗争	84
华中军民反“扫荡”作战	96
潘家峪惨案	103
枣宜战役	111
豫南会战	121
桂林文化城的新气象	128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	139
华北治安强化运动	150
清乡与反清乡的斗争	160
华南军民反“扫荡”反“蚕食”	170
田赋征实	179
大西南的开发与建设	189

上高战役·····	199
中条山会战·····	210
重庆大隧道惨案·····	220
第二次长沙会战·····	229
日军攻占香港·····	241
中国对日德意宣战·····	248
第三次长沙会战·····	257
联合国宣言签署·····	268
中国战区成立·····	277
中国远征军人缅作战·····	288
日阎安平谈判·····	302
“曲线救国”与降日风潮·····	311
“四行”与大后方金融建设·····	320
盛世才从亲苏到反共·····	332
浙赣战役·····	343
宋庆龄与国际援华团体·····	352
中美、中英新约签订·····	362
打通中印交通线·····	375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成立·····	386
延安整风运动·····	395
大生产运动·····	405
血腥的“七十六”号·····	415
国统区实行限价和专卖政策·····	425
陈纳德与第十四航空队·····	435
《中国之命运》的发表·····	444
鄂西会战·····	453
常德会战·····	462

中美英开罗会议·····	473
中美合作所创立·····	483
滇西攻势·····	493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延·····	504
美军观察组赴延安考察·····	514
豫湘桂战役·····	524
衡阳战役·····	535
史迪威事件·····	544
新四军对日军实施反攻·····	556
国共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谈判·····	567
新疆三区革命·····	576
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584
赫尔利使华·····	594
八路军王震支队南下·····	606
胡世合事件·····	616
豫西鄂北之战·····	624
花冈华工暴动·····	632
湘西会战·····	643
关于中国两种命运的论争·····	652
苏联红军对日作战·····	662
八路军对日大反攻·····	671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	681
芷江洽降·····	693
日本宣布投降·····	703

“孤岛”的畸形繁荣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上海英美“公共租界”和法国“租界”周围地区均被日军占领，“租界”如同孤悬于茫茫大海中的小岛，故名“孤岛”。

八一三事变前，上海的经济繁荣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各国新的经济危机而逐步褪色，人口不断下降，社会购买力日益萎缩。如，在报纸的分类广告栏内，在马路旁的电线杆子上，空屋出售或出租的告白日见其多，许多大房东用减租、让租或将房屋修饰一新等条件吸引新房客，但是过问者仍旧寥寥无几。市场方面，不少大商店登载“大拍卖”、“大放盘”的巨幅广告，宣称“不顾血本，推销存货”；南京路、福州路一带中小型商店甚至经常雇用乐队吹吹打打，有的叫两个店员站在柜台外长凳上大声叫嚷作滑稽对口，吹嘘价廉物美，以招徕顾客。但是买货的人远比看热闹的人少。其他服务性行业包括旅馆、酒楼、舞场、出租汽车等，也都门庭冷落，大非昔日可比。^①

但是，“八一三”的炮声一响，就迅速改变了整个上海特别是“租界”经济社会萧条的趋势。尽管“租界”外炮火连天，杀人盈野，而“租界”人口却在直线上升，“租界”内的经济、社会就这样逐渐又转向“繁荣”。

“八一三”以后，由于“租界”四周的上海地区及江、浙诸省先后沦陷，这些地方的人口大量涌入“租界”避难，使“租界”内人口急剧增加。据统计1938年下半年，两“租界”内大约聚集了400万人。^②至1940年初，“沪两租界人口，……最多时超过五百万人以上，较战前增加一倍有余”^③。集中于“孤岛”的人口中，颇多各地的富商大贾，特别是江、浙等省战区内的—批资本家、商人和地主，认为“孤岛”是避难和投资的理想地点，纷纷携带家眷和巨额资财到这里来居住和经营。于是，原来冷清的租屋、旅馆、电影院经常客满，茶楼酒肆川流不息地吐纳着衣冠楚楚的人群，各种商店也无不生意兴隆。与此同时，沦陷区难民也纷纷流落到“租界”街头，到1938年初，已达23.3万人。^④他们主要是上海附近区域或华界中因战祸而倾家荡产的工人、城市贫民及农民，其中青壮年占了很大的比例。这就为“孤岛”经济提供了大批劳动力。那些官僚、政客、流氓、娼妓等消费者及外国商人冒险家也来到“孤岛”，这就进一步造成对消费物资需求的迅速扩大。

除人口的剧增外，大量的游资也纷纷向“孤岛”集中，这也成了促成“孤岛”经济繁荣、社会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据估计，当时以游资形式出现在上海的资金，“大概有二十五亿元以上到四十亿元的数目”^⑤，到1940年5月底，游资已达到50亿元以上。^⑥这些游资的来源除了前述的江、浙及内地富豪携带巨款流入上海以外，还由于1939年上半年天津“租界”遭到日本侵略军的威胁，引起了北方资金大量南移，相当部分转趋上海“租界”；西南各地对“孤岛”贸易入超，年达5至6亿元以上，也造成大后方资金大批流沪；^⑦此外，因广州沦陷以前逃往香港等地的资金，又复归上海；东南亚一带的华侨资本，也因受欧洲战争的影响，而被“孤岛”吸引了过来。一些资本主义国家

的大商人，也在上海“孤岛”进行巨额投资。如1941年，“英国在上海投资，约一万零四百万英镑；据美政府最近估计美国在上海投资约一万二千万美元”^⑧。以上这些来自各方的巨额资金，都是在“八一三”战后短期内急速集中起来的，其中相当部分用于工业生产与商品流通领域，这就为“孤岛”经济繁荣准备了资金条件。

由于上海租界人口急剧增加，社会消费需求即随之大幅度扩大。饮食业、面粉业、棉纺织印染业、衣着业及其他各有关行业都因此而出现供不应求和市利百倍的局面。仅以1938年6月份的食品供应为例，计有牛2 623头、猪31 091头、羊783只、鸡1 071只、蛋64 791篮、米175 441袋、麦31 781袋、蔬菜10 217袋。^⑨巨额的消费数量，加上囤货抢购，就使得“孤岛”交易活跃，市场供销两旺。

沿海、沿江经济发达地区的相继沦陷，中国内地、战区以及西南各省，工业都十分落后，所需工业品大都要到上海“孤岛”市场上来购买补充，这就加剧了上海“孤岛”市场上工业产品供不应求的局面。又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各资本主义国家忙于战争，大都无力对外倾销商品，不得不一度放松对中国市场以至东南亚市场的压力。加上中国人民坚决抵制日货，海外华侨提倡购买国货，使得“孤岛”产品不仅得以畅销国内市场，而且畅销于东南亚等地，这为“孤岛”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为宽广的销售市场。以棉纺织业为例，“西南各省每年缺少棉纱12万件，棉布400万匹，大部都需要仰赖上海方面供给”^⑩。纺机工业，除了供应租界内迅速发展的各类轻纺工业所需的机器设备以外，还有部分转入内地市场或出口外销。如向襄球铁工厂订购丝织机的，“内地方面，有云南蚕丝厂、四川丝业公司、贵州丝织厂、重庆丝厂、富华贸易公司等……，浙东各地如嵊

县、诸暨等地的各丝厂……订购简易缂丝机，共计有五六百台”^①。“孤岛”工厂还将大量的各种工作机床、丝绸、棉布、玻璃、陶瓷、电料、皮件等产品，远销印度、澳洲、香港、东南亚以及美洲各地。

上海经济一度出现的繁荣景象，主要表现在租界中的工业、商业、金融业以及交通运输业等方面：

工业以纺织工业（包括丝织、染织、棉纺、缂丝、毛纺及针织等）和金属机器工业的发展最为显著。据统计，“八一三”事变前，上海纺织业最盛时有工厂 1 006 家，机器制造业最盛时也有工厂 970 家，到 1939 年底，分别增至 1 235 家和 1 261 家之多。^②此外，卷烟、面粉、制革、造纸、玻璃、橡胶等工业也纷纷开设新厂。截至 1938 年年底，上海租界内的工厂数共达 4 700 余家，超过战前二倍以上。^③1939 年情况续有发展，这一年新开设的工商业户，共计 392 家，平均每月就达 32 家。^④这在上海“租界”的发展史上是不曾有过的。

工厂雇佣工人的数量不断增加也反映了工业的发展。在上海“租界”中部、西部以及越界筑路区域以内，“一九三五年的时候，只有工人九万；一九三八年底的时候，工人数量增加到十五万五千人”^⑤。上海租界内各区就业工人总数，1938 年底“亦跃达二十三万七千余人。竟超过民国廿四年（1935 年）底的二十万人”^⑥。1939 年仍持续增加。据“租界”工部局管理工厂事务股统计：这年 10 月份，“公共租界”及西区界外马路各工厂雇佣工人数达 211 550 人，较 1938 年同时期的 143 256 人，增加了 68 294 人，比当年 9 月份也增加了 10 000 余人。^⑦

商业方面：据统计，百货店在 1938 年至 1940 年间增加了 500 余家。1938 年新设的 491 家工厂和商店中，饮食商店达 129 家，日用品商店有 85 家，衣着商店有 58 家，文化商店有 53 家，

医药店有 31 家，娱乐场所 27 家，装饰品店有 26 家，其中新设商店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⑧进出口贸易，“八一三”战后，整个上海曾一度衰落，数额大幅度下降，外贸中心转移到香港及广东各口，但自广州、武汉等地沦陷以后，外贸中心又转回上海，并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据海关统计，1939 年，上海进出口贸易总值共为 1 171 801 496 元，较 1935 年增加 680 528 110 元，较 1937 年亦增加 258 561 946 元。^⑨

金融业方面：这一时期，“租界”内“银行有 208 家，钱庄 212 家，较战前银行多 134 家，钱庄多 120 家”。钱兑业在战前仅有三四十家，至 1940 年已达百家以上。^⑩随着银行和钱庄的大量增设，存款数额也急剧增加。1937 年八一三事变前后，上海各银行的存款数额曾大幅度下降。“孤岛”形成后，“租界”内的银行、钱庄存款迅速恢复上升。1939 年上半年全上海市银行存款共达法币 30 亿元左右，约占全国银行存款总数 50 亿元的 60%。^⑪与此同时，“孤岛”内的有价证券、票据交换额也不断上升，1938 年 10 月，每日交换数额达 1 000 万元，较之 1937 年底每日 300 万元左右增加了数倍，至 1939 年底，又激增至 3 200 万元，1940 年 4 月每日平均数竟高达 4 990.1 万元，^⑫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交通运输方面：“八一三”战后，全上海轮船公司的大部分轮船，有的被击沉或破坏，有的被日军强迫征用，有的内迁，保存下来的仅有破烂轮船十万吨。为适应社会经济和货运繁忙的需要，当时外商航运公司纷纷兴起。如英商太古公司、怡和公司、意商中义公司等都收买华商轮船，竭力扩充在中国沿海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航运，并迅速组织新的航运公司。“据查战后（指八一三后）新组织之外商轮船公司，较大者有意商之中意，美商之卫利韩、华美，葡商之正德、美利，德商之远东等数家。

此外德商礼和、鲁麟，挪商华轮等洋行，亦另设一部，经营航业。”^②不久，华商轮船公司也相继而起。上海内河轮船公司成立后，至1940年前后，开辟了内河航线“九十余线，航路延长达六千公里”^③。中华轮船公司1940年成立后，拥有95艘小型内河轮船，至1941年开通了崇明、芜湖、大冶、舟山、宁波、安庆、彭泽等12条航线。

这一时期“孤岛”的建筑业、房地产业，供奢侈消费的娱乐行业及与社会经济生活有关的各个领域，生意都较为兴隆，获利丰厚。

然而，这一时期“孤岛”的经济具有明显的殖民性质。如以棉纺织业为例，据1940年6月统计，外商在“孤岛”的棉纺织厂共43家，而华商才21家；纺锭数，外商为1 569 418锭，华商为585 194锭；布机，外商为22 171台，华商为3 963台；产纱量，外商为69 645吨，华商为33 951吨；产布量，外商为1 672 786匹，华商为215 577匹。^④金融方面，外国资本仅这一时期在“孤岛”就开办了27家，其中“英商五家，美商五家，日商八家，法商二家，荷商二家，德、意、苏各一家，又中法、法比合办者各一家。”^⑤除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行外，“所有上海第一流银行”都纷纷将巨额资金存入外商银行，特别是汇丰、麦加利、花旗等大银行，以求得到国际资本的庇护。据统计，1941年，“孤岛”的这些所谓“第一流银行”“存入于外商银行者至少达四五千万元”^⑥。

不少的中国民族资本企业为求得发展，也纷纷依附于外国资本。1939年，上海各厂所需的“澳洲之羊毛，南洋一带之锡、橡皮和铁，以及印度之棉花等，均须得英领事馆的许可证，而且对于进口数量，亦严加限制”。1940年夏美日关系紧张后，美国对运往上海的铜、铁和化学药品等，都加以限制。在原料输

人和制成品的输出方面，“孤岛”的民族工业，也必须通过和缴纳为日伪所把持的关税、转口税、统税等等。为了逃税，它们不得不“名义上都改为外国资本企业”，原租界内有名的“申二”“申九”两民族工业，自“八一三”后都改名外国资本企业，“申九悬英旗，申二悬美旗”。申九新厂甚至代替日商推销纱布，“常于夜间将日商同兴纱厂所产之纱，偷入本厂打包间，用申新纱厂商标，打包出卖”²⁸。

“孤岛”经济还具有较大的投机性。据统计，1940年若干纱商囤货达40万件，较之战前存底的4万件，高出10倍，并仍呈增长的趋势。从棉纱交易来看，1939年至1940年上半年，上海纱厂的投机交易平均相当实际销售的204%，有时高达526%。米、麦、面粉、五金、颜料、西药等商品的投机买卖也很盛行。

金融业投机更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当时，社会充斥大量游资，银行业对游资的处理，多用于买卖外汇、有价证券、股票及公债，买卖外国商品，买卖地产，经营建筑物及抵押放款等。这种狂热的金融投机，助长了市场上的商品投机，阻挠了游资向工商业的投放，破坏和影响了“孤岛”经济的正常发展。以1936年的产量指数为100，各业后5年产量变化如下表：²⁹

业别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1941年
棉纺织业	100	82	70	105	99	63
丝织业	100	73	96	27	104	97
面粉业	100	78	73	112	49	22
毛纺织业	100	89	60	165	173	150
橡胶业	100	66	25	42	46	51
染织业	100	82	73	214	233	196
机器业	100	100	56	112	154	125
纸业	100	116	147	244	381	396

从上表统计指数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孤岛”经济繁荣，具有

一定程度的虚假性，也就是畸形繁荣。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迅速进入上海“租界”地区，并大肆劫夺租界内的工商业。据统计，当时被日军“军管”的计有：纱厂18家、毛织厂3家，机器厂7家，火柴厂1家，造纸厂1家，酒精厂1家，玻璃厂1家，皮革厂1家，木材厂2家，印刷厂2家，卷烟厂1家。其中包括华商之挂洋旗者，如永安三厂、保丰、德丰、安达、合丰及申新九厂等。至1942年2月止，除被日军“军管”者外，“孤岛”全市有66家民族资本工厂被改为“中日合办”，90家被“委任经营”，31家被强迫“租借”，16家被强迫“收买”。使“孤岛”大部分工商业立即陷于停工停产的状态。以纺织业的棉纱、棉布的生产指数为例，假定1939年为100，那么1942年则分别为31、37。许多企业不仅失去了“孤岛”时期的“繁荣”景象，而且连原有的一点资财也损失殆尽。1943年，全上海市民营资本经营的工厂倒闭约三分之二，只剩下1145家。1944至1945年，幸存的工厂也是名存实亡，只有少数继续维持部分的生产。

注 释

①陶菊隐著：《“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2—3页。

②④⑨上海《新闻报》1938年10月18日；2月7日；8月15日。

③俞雄飞：《上海经济景气及其危机》，《中国经济评论》第1卷第3期，1940年1月，第57页。

⑤〔日〕长沼辛廷：《上海游资问题的动态》，《中国经济评论》第3卷第3期，1943年3月，第105页。

- ⑥重庆《大公报》1940年8月12日。
- ⑦《申报》1941年12月1日。
- ⑧《资金冻结后上海市场之动态及其趋向》，《中国经济评论》第4卷第1期，1941年7月，第24页。
- ⑩⑫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下册，第71、70页。
- ⑪《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28页。
- ⑫何子龙：《“八一三”以来之上海工业》，《中国经济评论》第1卷第1期，1939年12月，第63—67页。
- ⑬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3月11日。
- ⑭⑱⑳㉑㉒《战后上海之工商各业》，《经济研究》第2卷第4期，1940年12月，第1、4、3、3、80页。
- ⑮Robert W. Banelt：《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之上海工业》，《经济导报》第5卷第9期，1942年5月，第27页。
- ⑯㉑冯克昌：《上海繁荣的观察》，《商业月报》第19卷第5号，1939年5月，第1期第1页。
- ⑰《公共租界各工厂，工人数量激增》，《申报》1939年12月4日。
- ⑱专心：《一年来上海各公司商号变动调查》（上），《商业月报》第19卷第2号，1939年2月，第1页。
- ㉒㉓《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687、632、715页。
- ㉔施鑫泉：《战时上海华商棉织业之动向及其前瞻》，《财政评论》第4卷第5期，1940年11月，第16页。
- ㉕凤真：《论上海银行界的动向》，《中国经济评论》第4卷第2期，1941年8月，第7页。

第一次长沙会战

又称赣北湘北会战。1939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德、意法西斯的战争行动，扩大它对外的战争冒险，竟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任命西尾寿造大将为总司令官，坂垣征四郎中将总参谋长，全盘负责对华的军事行动。

西尾寿造和坂垣征四郎就职后的第一个军事行动，就是发动对湖南长沙的进攻。

1939年8月，受命进攻长沙的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制定了《江南作战指导大纲》。其指导方针是：一、军主力在隐蔽中做好准备，大概于9月下旬开始行动，将第九战区主力消灭在汨水河畔。在此期间，派一个师团的兵力策应军主力，先将高安之敌消灭后，再转向修水上游配合围攻第九战区主力。二、实施作战以奇袭为主，尽量在短期内结束战斗，然后恢复原来态势。

9月10日，冈村宁次命令中井9月15日开始攻击奇袭和突破奉新西面阵地左翼，深入其背后，首先将敌捕捉和消灭在高安西北地区。13日，冈村把军指挥所向前移到咸宁，准备指挥主力进攻湘北。冈村这次战役的主要目的是要把关麟征的第十五集团军包围和消灭在平江周围。他的设想和部署是：第六师团突破新墙河后向汨罗江南面高地进逼，奈良支队由平江方

向从右向左迂回，上村支队偷偷插入第十五集团军背后切断退路。同时，第三十三师团在鄂南由通城进攻，切断第九战区赣北与湘北的联系，除留置一部分兵力阻止赣北援军外，全力协助消灭第十五集团军。中井指挥赣北各部的任务，首先是拖住赣北的第十九集团军并予以歼灭性打击，然后再向湘北前进围歼第十五集团军。

第九战区根据战区地理形势、武器装备、兵员素质以及军委“利用既设数线阵地，逐节抵抗，以消耗敌人，换取时间”等指示，于9月上旬制定了作战指导方针：战区以诱敌深入后进行决战为目的，敌进攻时，以一部兵力由第一线开始逐次抵抗，随时保持我军于外线，俟敌进入我预定决战地区时，以全力开始总反攻，包围敌军而歼灭之。

根据这一指导方针和日军进攻湖南的三个可能方向，制定了相应的三套作战方案。第一方案：如日军全力由湘北进攻时，那就预定在长沙以北捞刀河下游地区与敌决战；第二方案：如日军主力由湘北及各以一部分由赣中、赣北进攻时，那就预定在上高、铜鼓、长沙各附近决战；第三方案：如日军由鄂南全力进攻常德时，那就预定在常德附近决战。

第九战区当时各兵团部署是：第十九集团军以及第一集团军，防守赣江以西，沿锦江南岸，经高安、会埠一线；第七十四军作为机动部队置于上高、万载、分宜一带。第三十集团军在武宁占领琵琶形沿甫田桥一线。第二十七集团军防守渣津和游击于咸宁、崇阳、蒲圻地带。第十五集团军防守新墙、营田、浏阳以及九岭、渣津等地区。第二十集团军担任洞庭湖防守，控制常德、桃源等地区。第四军控制长沙、衡阳。新六军、新三军、第五军控制株洲、醴陵、湘潭。第十一师驻守岳麓山，作为战区预备队。此外，还有第七十军驻在长沙附近，准备参战。

1939年9月中旬，日军从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向向长沙发动进攻。

赣北方面：日军先以一路从赣中向高安方面攻击，接着又以一路由武宁、修水、铜鼓向西南进攻，形成赣北两个方面的战斗：即高安方面的战斗和修水方面的战斗。

日军进攻高安，其目的是想牵制第十九集团军，不让这五个军（七十四军、三十二军、四十九军和第一集团军的五十八、六十军）参加湘北方面的决战。9月14日，日第一〇六师和第一〇一师一部，在空军配合下，由赣北的奉新、靖安、高安向西猛攻，企图夺取修水、铜鼓，进逼平江、浏阳，而与湘北入侵之日军相呼应。经过几次激战，第五十八军阵地高邮市和杨庄失守。杨庄是祥符观外围据点，它的失守使祥符观亦岌岌可危。而防守祥符观的第六十军，在日军的围攻下晕头转向，对身边的敌情一无所知。18日早晨，日军已占领村前街，第六十军军长安恩溥却不知道，还在指挥军部往村前街转移，结果遭到日军袭击，通信总机也被日军夺走，于是第六十军军部与第一集团军、第一八四师曾一度失去联系，陷入混乱状态。六十军伤亡惨重。

高邮市和杨庄失守后，罗卓英命令第一集团军代司令高荫槐一定要收复阵地。高立即命令第五十八军、第六十军收复失去的阵地。于是第五十八军军长孙渡督促其新第十一师师长鲁道源收复高邮市，第六十军军长安恩溥也命令所部收复杨庄。鲁道源亲率所部数次猛攻高邮市，虽然伤亡很大，但终于收复了高邮市。安恩溥指挥他的第一八二师，也收复了杨庄。安还派第一八四师增援第五十八军新十师，稳住了祥符观阵地。第一八三师正面阵地战斗也较激烈，日军猛攻骑马山达一个星期才停止。